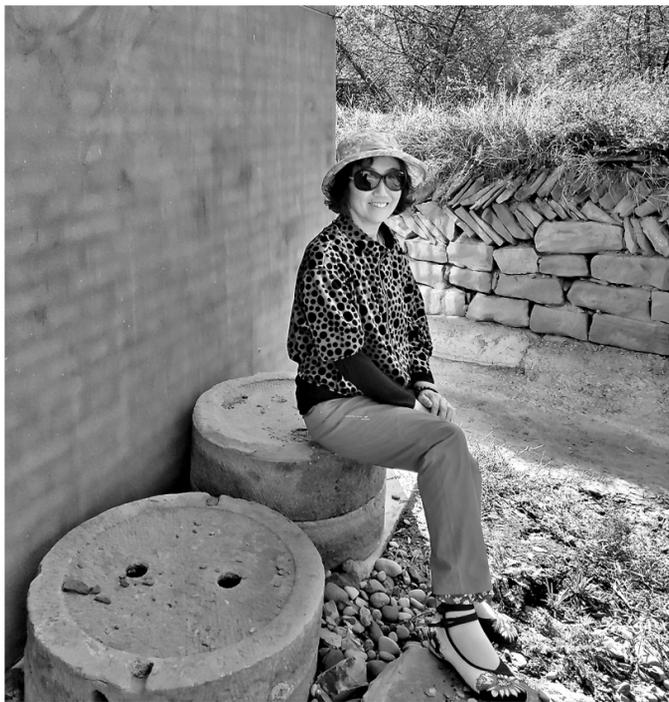


走过青春

“我的第二故乡”——北京知青回延安掠影



● 北京知青王晓兰在北京知青林前留影



● 北京知青王凤云在曾经插队的延川县冯家坪寺村



● 北京知青重回故地,与老乡(右一)动情相拥

鸡血面

胡德水

插队的时候,我被分配到延安洛川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,那个小山村在洛河川的洛河西岸。算上我们知青户,村里才有十七户人家,一百来口人。这里沟壑纵横,山高入稀。这里野生动物很多,有野兔、野猪、狼、獾、狐狸和孢子,听本村的人说,这里还有土豹子。

我们到村里以后,很快就和村民熟悉了。由于我们总是拿吃的东西喂村民家的狗,没过多久,就连村里的狗都和我们熟了。二月底,陕北还在下雪,我和一位同学带着两只很厉害的狗到离村很远的山沟里去玩儿。在山沟里,我们发现了一个山洞,洞不大,起初,两只狗冲着这个洞汪汪地叫。随后,那只大黄狗突然钻进了洞里,从里面叼出来三只类似小狗的动物,不过已经死了。我们把这三只死了的小动物带回村里。村民们看到这三只小动物后,都很惊愕,都说它们是死了的狼娃子,并且让我们把小狼的尸体扔到了洛河的边上,还一再嘱咐我们晚上千万不要出门。果然,到了夜里,母狼在村子里嗷嗷叫,那声音很是凄惨。

六月份,村里进入了收麦、打麦的季节。麦场上,干活的场面热火朝天。打麦场下边就是洛河,一位村民把自己家的一只奶羊拴在了麦场边的一棵树上。随后,大家都集中在麦场干活。干活中,突然听到有人

喊:“狼吃羊了,狼吃羊了!”我和干活的人往麦场的边上望去,原来是洛河东岸有一个过路的人看到两只狼在吃那只奶羊。我和几个男村民立刻冲向场边。看到人来了,一只狼顺着洛河岸往南跑了,另一只不是狼而是村里的一只大狗。这时候,那只奶羊已经被狼和那只狗吃了一大半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,一晃到了次年的九月份。有一天,村里一个叫岁棒儿的村民急急忙忙来到了我们知青住的地方,说他三岁多的儿子不见了,请我们帮忙去寻找。听了他的话,我立刻和两个同学奔了出去,全村的人也加入了找孩子的行列。我们先去前沟等地方去寻找,没有找到。又来到村里的两口井的旁边找。只见井口离井水水面有三四丈深,什么也看不清,只有人下去才可以知道里边的情况。队长和大家商量,看谁能下去。大家都有点发怵。这时,我站出来对大家说:“我下去。”于是,乡亲们先把我用井绳拴紧,又把我的双腿分别套牢了,然后用辘轳把我放了下去。

我手里拿着手电筒到了井下边。往水里照去,水里除了有几只青蛙和一些碎草之外,什么都没有。他们把我摇了上去。又用同样的方法看了另一口井,同样没有发现任何情况。

我从井中上来以后,看到孩子的父

亲着急异常,母亲痛哭流涕。三岁多的男孩子能跑到哪儿啊?找到最后,在村外后川的洛河边上找到了这个孩子。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跑那么远呢?真是莫名其妙!幸运的是,虽然让大家等着急了半天,但孩子平安无事。

晚上,我们几个知青正准备吃饭,岁棒儿来到了我们住的地方,非要我们到他家去,我们也没多想就去了。原来是他们想请我们吃饭。到了他家,大家坐到他家的炕上聊天。一会儿工夫,炕桌上摆了几样不同的酸菜,还有陕北特有的油泼辣子。就在我正聊得火热的时候,岁棒儿的婆姨端上来几大碗香味扑鼻的面。夫妻俩热情地招呼我们赶快趁热吃。

陕北这个地方虽说生活很苦,又缺少各种佐料,但这面条做得香味甚浓,碗里还有成块的鸡肉。我就问岁棒儿婆姨:“这面条做得真好,怎么这么香?”她说:“这是鸡血面。就是把一只大公鸡杀了,用大公鸡的血和的面擀成的面条。这是陕北人招待贵客时才做的一种面食,给你们做这道美食,也是对你们的一种感谢。”

其实,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。这是我第一次吃鸡血面,至今还记忆犹新。除此之外,陕北人的朴实、热情、豪爽更是让我难忘。

瓜田月色

郝承芳

1969年一个夏日的傍晚,我和同学雅玲、王琳兴奋地走在陕北延安山区的小路上。

昨天,队里赶车的老汉给我们捎来了我们在王屯插队同学的口信,邀请我们今天收了工,去她们那里吃小瓜。这不,刚一收工,我们连脸都没有顾上洗一下,就放下锄头,迫不及待地出发了。

王屯是我们下坪公社的第一个生产队,平日里,我们去蟠龙赶集都会路过那里。

我们班的姜岩和徐岩在那里插队。姜岩个子很高,我们都叫她大老姜。徐岩留着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,走起路来,辫子随着扭动的腰肢甩来甩去,很是好看。两人都很直爽和热情,因此我们的关系都很好,经常走动,有什么事情也会互相帮助。

刚插队的时候,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女孩子,从来没有离开过家,更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。插队第一年,国家每月给我们供应45斤毛粮,多是玉米和高粱及少量的小米。我们队的王琳比较能干,也有主见,在她的指导下,我们每天做饭都是按计划来。就连用几个土豆也要过秤,再搭一些糠和野菜。这样的话,虽然每顿都吃不饱,但是也不会断了顿。而姜岩和徐岩,由于计划不周,往往还没到月底就

没粮食了,只好跑到我们队里来求助。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吃的,也就是糝菜饭里再多加点洋芋和菜,大家凑合一顿。她俩来过几次之后,就觉得过意不去。徐岩说她们队里种了一片小瓜,到时候熟了请我们去吃小瓜。我们也听说当地的小瓜特别好吃,于是也就心心念念地惦记上了。

过了马家沟,很快就到了王屯,姜岩和徐岩已经在路边等着我们了。我们相跟着来到小瓜园,看小瓜的老汉有五十多岁,穿着一身黑色的裤褂,头上系着白毛巾,看我们来了,笑眯眯地招呼我们坐下,站起身帮我们挑小瓜。

只见他来到小瓜地,俯下身子,看看这颗,拍拍那颗,一会儿的工夫摘了十几颗小瓜,拿了一杆秤,称了重量,又拿出一个小本子记上账。然后转身招呼我们:“学生家,快来吃小瓜,管保个个熟,甜得很!”我拿起一颗小瓜,看小瓜的样子并不漂亮,甚至可以说有点丑。黑绿色的表皮,带着一些浅黄色的道道,小瓜呈长圆形,也不是很规则,有点歪七扭八的,既没有北京香瓜漂亮的形状,也没有新疆哈密瓜金黄色的表皮,我不禁心里犯嘀咕:“这小瓜能好吃吗?”

姜岩左手拿着小瓜,右手在小瓜上一拍,只听“咔嚓”的一声,小瓜已裂成两半,一

股浓浓的香气扑鼻而来。

真香啊!里面的瓜肉金黄金黄的。我们几个再也顾不上矜持,学着姜岩的样子,打开小瓜,甩了甩里面的籽,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这小瓜真是又甜、又香、又沙。不一会儿,十几颗小瓜就被我们吃光了。再看看我们几个,脸上、嘴边、手上甚至鼻子上都是黏乎乎的小瓜汁。看小瓜的老汉怜惜地瞧着我们的吃相,笑得脸上深深的皱纹都舒展开了。起身又摘了几颗小瓜,递给我们。这次他没有过秤,也没有记账。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小瓜,直到今天,我再也没有吃过如此香甜美味的小瓜了。

天渐渐黑了,一轮明月升上了夜空。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,银色的月光洒在瓜田里,隐隐约约传来蛐蛐儿的叫声。我们走在回村的路上,打着饱嗝,心情无比愉悦,无比满足。看着圆圆的月亮,王琳高兴地唱起了歌:

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……”

我和雅玲一起接下来唱:

“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。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,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。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,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……”

歌声伴随着月光,飘荡在乡间的小路上。

买蜂记

姚锐

到延安插队的第一年秋收后,我们每个人除了分到一年的口粮,就只分到7块多钱。为过年买了块猪肉,就没钱了。穷则思变,当我看见队长养了一窝蜜蜂能吃蜜,就想养一窝试试,给生产队的集体副业寻找个出路。

第二年夏天,看着花丛中飞舞的蜜蜂,我把这想法跟队长说了。没两天,他就帮我到外村找到了一窝转让的蜜蜂,还让村里的老地主白望凌和我一起把那窝蜜蜂抬回来。说起白望凌,并不老,当年不到五十岁吧。方方的黑脸盘,话不多。人多的时候,他都是在吞烟吧吧啾啾抽烟。之所以叫他老地主,是因为一般的书籍里都称解放前的地主为老地主,我们也如此称呼。他虽然号称地主,却是村里最穷的人。他有六个娃,因为没有足够的衣服,所以冬天的时候,他们就不能一起到窑洞外边的院子里活动。他的身世没有人能说清,只是说他是地主的儿子,他爹早死了。但是村里不能没有阶级斗争的对象,他这个地主儿子也就被人们称为地主。

我们刚到村里插队不久,公社的武装部长来村里开了一次会。会上,首先是做备战动员。动员之后,就是开批斗会,批斗老地主白望凌。整个会程,除了我们知青代表吕大姐发言,表态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以外,都是公社武装部部长在讲话。讲到后来,开始动手了。他用食指一下一下戳老地主的脑门,口中念念有词地批判着地主阶级。老地主双手始终下垂,脑袋随戳而动,挂在脖子上的烟锅烟袋也一颤一颤的,但始终一声不吭。散会之后,大家还和往常一样,并没有把他当成阶级敌人。

我猜想还有一个原因,是老地主的大儿子二娃是队里的骨干,也是村子里的雷

锋。地里有啥需要什么需要额外跑腿儿的事,队长的眼光就会落到他的身上,低声说:“二娃,给咱咋弄咋弄。”话没说完,天生一副笑脸的二娃就在溜腾起的黄土中跑没影了。

和老地主一起去买蜂,来回要走几十里路。那年才16岁的我,稀里糊涂的,连水和干粮也没有带就出发了。走到饥渴难耐之时,经过一片西瓜地,没想到老地主和种瓜的认识,两人吧啾着烟锅子聊天,我则在一旁吃西瓜。尽管瓜农一再让老地主吃瓜,但是他只是在那儿抽烟,一块瓜也没动。

终于到了养蜜蜂那家,掂一掂蜂窝,荆条编的,里边黏土糊就,有几斤重。我们两个用一根扁担担他担在中,沉甸甸的,走平道还行,只是已经过了晌午,早饭和西瓜早在一路行走中消耗,肚子咕咕叫了。在半道上,不知怎么的,老地主把我带到了一户人家。一看,这家刚办完喜事,给饸床子还架在大锅上。老地主和这家好像也认识,又是过去与人家聊天,还介绍我是插队的北京娃。大概他告诉人家给我压一碗饸饹,他自己不吃,所以人家只下了一碗给我。一满勺浓浓的西红柿臊子浇上饸饹,味道酸咸香辣,让人胃口大开。老地主蹲在一旁还是抽他的烟,吧啾吧啾的,喉结间或一动,咽下口水。少不更事的我,却接过碗来,几口就把饸饹吃完,可臊子汤却还剩下不少。汤是好汤,但是单喝还是太酸太辣,我又喝了几口就放下了碗。只见主家闲话间,一抬手竟把我碗里剩下的汤又倒回了汤锅。后来我才知道,当地就是这么个吃法。没有这么多汤,饸饹不好吃,汤剩下又浪费,所以这么轮流吃,有点儿像四川不换锅底的火锅。有了这碗饸饹垫底,若遇上个灾年,我也算是有了外出化缘的基本功。

抬蜂窝的时候,我在前,老地主在后。上山时,我虽然得在前面奋力扛起,但是重量都压在了老地主的身上。大半天没吃没喝的他,好像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,带着我一步一步把蜂窝抬了回来。对这个为我一路化缘的老地主,我也和村民们一样,自始至终没有把他当成阶级敌人。

之后,我离开延安去部队当兵,又回到北京,一晃几十年。

十多年前,有一天,他的二儿子栓殿给我打电话,说他的儿子在北京的一个小区当保安。我赶紧请这老地主的孙子在他附近的大饭馆吃了顿饭,又给他打包了一个红烧猪肘,还塞给他五百块钱,让他买生活用品。本以为他来北京是要长期打算,想帮他谋划,他却说只想干三个月,玩玩儿就回家,还是家里好。

改革开放以后,延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老地主一家的日子也和家一样,逐渐红火起来。

2005年,我和插友们回延安时,看到老地主白望凌家新打了三孔窑洞,都是石面大圆木窗,这在窑洞里算是豪宅。我插队那会儿,都是土面加木门,门上有一孔纸窗。他的院子里还支着一口大锅天线,一个挺大的电视里放着凤凰台的节目。这个过去通信靠吼的村子,也联结起了五湖四海。白望凌还是老样子,没什么话说,只是兴奋地望着我,吧啾着他的烟锅子。我塞给他三百块钱和一条烟,他还是不知道说什么,只是往后躲了一下,笑眯眯地看着我。

从延安回来几年后,我打电话给村里,问起各位的情况。谈话间,乡亲们告诉我,白望凌病故了。

从此,村子里再也没有了地主,他是最后一个。